

##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 激活内生动力,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 艾斐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精神,文化是文明,文化是智慧,文化是方略。

正由于文化的这一特定内涵和丰宏意蕴,遂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的精神之轴、社会的文明之源和国本国运的坚定基石与强大动力,并由此而决定了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绵长而璀璨的五千多年中华传统文化与灿烂文明中走出来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了全程对接,而且达成了高度融合。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深厚底蕴与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源源不断地注入了璀璨的时代光彩与不竭的创新活力。正是在这种相濡互激中,不但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而且使中华文化与文明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范围和深层次上实现相洽相融、互激互励,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大幅度实现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新突破与大发展。

## 一、传统文化与文明的重要价值

正因为文化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发展的动力,而文明与发展则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与本能冀求,因为它能给生活添光彩,能为事业赋能量,能使人人生有价值,能让社会有动力,并因此而成为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与本能冀求。唯其如此,早在两千多年前,集儒法学术思想与文化粹质之大成的荀子便深有感悟地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显然,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身上有“义”。而这个“义”的本质内涵便是以“道”与“理”、“德”与“智”为核心意蕴的文化与文明。

显然,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与草木、禽兽具有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身上有“义”理,而这个“义”就是文明、道德、理智、精神、感悟力与创造性等的萃聚与升华。而凡此种种,则均为文化之内涵与本质的萃聚、辐辏与延伸。由此足见文化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所秉有的不可或缺性与极端重要性。唯其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并因此而要求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因为只有“自信才能自强”,“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而我们则不仅有自信的冀愿与需求,而且更有自信的本底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延绵不绝,遭逢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而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目标、新任务,我们就是要以这种自信的底气筑基铸魂、赋能聚力,全方位、大跨度、高水平“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此,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牢牢“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特质与内蕴。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构建和有效实践,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不仅赓续和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的精神粹质与思想内蕴,使之得以发扬光大,而且赋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以新的时代光彩与精神内涵,遂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锻造与淬炼下,不但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且焕发了新的光彩。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支撑,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脉与精神内核,更为显豁、极

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深厚底蕴与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源源不断地注入了璀璨的时代光彩与不竭的创新活力。正是在这种相濡互激中,不但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而且使中华文化与文明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范围和深层次上实现相洽相融

为有效地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宏阔而巨远的历史纵深,使之得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引领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观照下,获得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启迪与烛照,从而得以尤具方略和更有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故而,它不仅获具先进的思想引领与科学的理论支撑,更富有旷远的文化烛照与深厚的历史底蕴。唯其如此,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获得先进性、科学性、真理性的同时,更兼有了历史根脉、文化光彩与文明内蕴的涵濡、烛照与支撑,使其在兼具先进而科学的真理性的同时,更富有文明的粹质与文化的光彩。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实践的关联

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建、开拓和创造性探索与跨越式发展中,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行新突破,获得新收获,实现新发展,达臻新高度,其关键环节和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正因为如此,才得以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大幅度、广义涵、深层次上不断地实现有效赓承与高度升华,并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持续趋于优化,实现转化,达臻粹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淬冶与时代的检测下,随着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不断丰富发展,从而得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有效衔接,进而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度文化浸润与全程文明观照。

故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而也正是这五千多年中华文化与文明,才得以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与康庄大道,所以在实现过程中,必然和必定会在中国式现代化征途中赋予中华文化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化与文明也必定和必然地赋予这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文化底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

明重焕荣光”。正由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有中华文化与文明极为深远、宏厚而强大的精神支撑,并由此为我们建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肇发了正确的精神导向,使我们得以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进军中,始终方向明确、步履坚定、意气风发、信心满满。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底气。

在传统意义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不仅从未断绝,而且一直绵延至今。事实是,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巨远绵长的文化与文明始终襟连脉动,从未断裂。特别是当历史进入到春秋时期,更迎来了中华文化的空前兴盛与繁荣,出现了以儒、道、墨、法等为代表的学派林立、学术繁荣的文化鼎盛与文明昌达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建构与文化创新、思想开拓与理论争鸣,不仅为早期中华文化注入了激情与活力,而且使中国文化更具丰富的内涵和创新的激情。春秋文化和诸子百家的思想传播与文化影响,更是大大启迪和深深激励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创造活力,使中国社会得以在接下来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一个又一个的文化高潮与文明节点上,奋力进行社会变革,全面实现精神升华,进而形成和积淀了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丰富性、实践性与时代感,赋予了我们坚定而强大的文化自信。

而也正是在这一实现过程中,我们既要有开放包容的视界与胸怀,又要有守正创新的意识和方略,特别是始终都要在坚持文化自信中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大力弘扬,展现文化的文明粹质与时代风采。自觉而有效地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光彩与精神质地,使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富有新思想、新理念的精神光彩,而且更符合新生活、新时代的现实冀求,特别是要从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历史粹质中总结出中国经验,升华出中国理论。要高度自觉而有效地用中国文化和文明为中华民族立德树树、筑脊铸魂,使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得以始终独立自主、永远昂扬向上,不但秉承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高度自觉,而且富有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的执笃追求。

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开放包容和守正创新。因为只有开放包容,才能广摭博采、集众萃菁,全方位、大幅度地地摭和吸纳全人类的创新成果与先进经验。只有守正创新,才能在正确的导向下获得新突破、实现新发展。对于我们来说,这守正,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勤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创新,则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旨向和需要,使文化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特别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在传承赓续、推陈出新的基础上,按照新时代、新目标、新使命、新任务的特质与特需而不断开拓新思路、建构新机制、创设新形式、提炼新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三、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光彩

在创造性转化中实现创新性发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特点与精神特质,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机理与发展动能。这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随着历史的延续,社会的变革和人们思想认知的持续迁转与提升,不断地闪耀光彩、焕发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它被赋以历史的真切与世态的生机,并因此而得以在客观再现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译之法则与规律的同时,更为人们提供社会生活的运行法则和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人们在不同阶段的实践体悟与经验总结,从而在客观上为后来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主席深有体悟地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习近平总书记则进一步强调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水有源,树有根,源流关系与本末法则,从来就是事物生成、运转、进化、升华的不二铁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衔接和高度契合就是这样。唯其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故而,“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优势,不仅表现在历史悠久、根脉绵长、形态多样、内容丰富,而且充盈着正气与浩气,弘发着理想与道义,秉守着刚正与坚毅,激扬着自强与自信。它不仅辉煌、繁茂,而且悠长、亘远,是世界四大文明中迄今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古典文明,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变革中不断呈现出勃勃生机,释放出满满能量,从源头和根脉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全程对接与高度契合,不仅为我们的新生活、新事业、新道路、新变革进行了强有力的引掖、支撑和铺垫,更为我们的新生活、新事业、新道路、新方略赋予了充满魅力的激情与活力,使我们得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认知基础和精神的基石上豪气十足、信心百倍地开辟宏阔深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不仅给了我们强有力的启迪、铺垫与支撑,而且尤其赋予了我们更充分、更强劲的底气与信念。因为历史就是过往的现实,而文化与文明则是强大而永恒的精神之砥与智慧之源。由此而决定了秉承历史、赓续文化、传播文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唯其如此,鲁迅才盛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事实上,正是司马

迁在《史记》中用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130篇、共约52万字的篇幅,一直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轩辕氏写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计约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而这一历史时段,正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发初期和繁荣期之一,不仅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升华与学术争鸣,而且形成了以杏坛和稷下学宫等为中心的文化传习之所与理论争鸣之苑,特别是《诗经》《论语》《春秋》《尚书》《易》《礼记》《荀子》等的问世,更炽化和强化了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早期弘扬与广泛传播。特别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集中出现,更使中华文化与文明成为世界文化轴心的内核与砥石。

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不仅形成早、发展快,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进步持续发展,不断地展现新光彩。每一个朝代都富有独臻优熠的文化特色与文明粹质。闻一多为什么要把唐诗说成“诗唐”呢?就因为唐朝不仅出现了诗歌创作高峰,而且更是由诗歌所彰显的这种精神推动了整个朝代的兴盛与繁荣。唐朝涌现了成千上万的杰出诗人和优秀诗歌,而且在当时,从皇室贵胄到船夫轿夫,各个阶层都有人写得一手好诗。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繁荣不仅推动了社会文明与进步,更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政治清明。盛唐时,长安的兴盛与繁华也远超当时的罗马和巴黎,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大都会。当时不仅聚集了全国的商帮与文士,而且吸引了中亚、日本和欧洲的客商和宾客。正由于经济繁荣和人口众多,长安108坊皆人满货足,更为发展营商而专门开设了西市和东市,进行物资,发展经济。正由于人们把从东市和西市买来的货物统称为“东西”,久而久之,“东西”一词也便成为货与物的习惯性称谓,迄今犹然。由此足见文化对文明的氤氲与激扬。元朝时,《富春山居图》的灿烂问世,元曲和青花瓷的走红欧亚,则足以让当时的中国文化令人艳羡。其中,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马致远等人的剧作更足以为成为亮点。哥伦布为什么要出海并远赴亚洲?就是因为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十分羡慕和向往远在地球东隅的中华文化与文明。而马可·波罗所记录的,才仅仅是元朝时期的中国北京和杭州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文景观与市井风貌,就这也足以使哥伦布深深倾倒,并决心冒险东行,一览灿烂的中国文化之文明盛景。

中华文化与文明不仅悠久、亘远、绵长、厚重,而且新、粹、精、艳,富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鲜明的时代光彩,不仅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足迹,而且焕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光彩,尤其是在中华文化底蕴和文明内蕴中更充盈和熠熠着中华民族的开拓勇气与创新精神,并由此而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强大支撑与深厚底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作者系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西省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 “我为自己是生于台湾的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上接第1版)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看来,陈映真是一位具有深刻思想性的文化批评家,“读他的文论,能够感受到他的思想视野非常开阔,是具有世界性的思想家”。陈映真进入文学世界,是从鲁迅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开始的,他的创作清晰继承了左翼文学的发展脉络,这与他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认同是一致的。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赵刚谈到,陈映真的创作是在反思中推进的,正是对中国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性思考,让他深切认识到自己是中国的孩子,所思所言都与祖国紧密相连。“是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胸怀世界,那是一种全身心投入其中,力争让仁爱、真理、宽容、正义长存人间的情怀。”“陈映真的人格力量,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和选择上,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魄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张志强说,陈映真身上融合了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促使他去关心弱小的民族和底层人民,跟全人类的命运发生深刻关联。

“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比陈映真写得多,比陈映真流行的作家不在少数,但是像他那样思想严肃、充满人间关怀的作家非常少见,尤其是在当下的消费时代。”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表示,具有严肃思想和人文关怀的文学才是伟大的文学,

学界需要重新思考文学的严肃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张重岗说,陈映真从不回避棘手难题,直面两岸核心问题,深化民族文学观念,用大无畏的勇气在艰难处境中破开了一条道路。

吴春梅、齐晓红、陈福裕、曾庆瑞、朱双一、范振国、何玉、李娜、林一明、徐秀慧、钟俊陵、刘奎、邱士杰、张立本、黄琪椿、关晓荣、徐纪阳、欧阳月姣、林哲元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陈映真的创作始终牢牢把握时代脉搏,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关注人”,而且“爱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广大同胞的深沉的爱,体现出真正的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民大众中的一员,与广大同胞荣辱与共、兴衰与共、生死与共、祸福与共。陈映真的思想和精神,值得我们长久传承和弘扬。

今年以来,中国作协举行了一系列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学交流的活动。中国作协港澳办公室组织举办了“两岸文学交流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相继接待了刘兆玄、张晓风、绿蒂、夏祖焯、杨渡、詹詹等台湾文学界人士,举行相关讲座及作品、手稿捐赠仪式,这些活动有效促进了两岸文学与文化的沟通、分享与合作。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中国作协港澳办公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相关负责同志。

## 施家彰诗集《玻璃星座》分享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美国华裔诗人施家彰首度在中国译介出版的诗集《玻璃星座》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日前在京举行的该书分享会上,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诗人、评论家唐晓渡、王家新、蓝蓝、高兴等与施家彰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诗人具有东方诗歌意象及精神特点的诗歌世界。

在《玻璃星座》中,施家彰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日常经验与游历亚洲期间的经验穿插并置,展现其结合中国古老道家思想与西方现代量子力学的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呈现出平衡而独特的诗歌美学观念。

吉狄马加说,西方诗歌传统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是施家彰写作的两个维度,他的诗写得精准而平静,反映出美国诗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注重语言张力和细节的特点。唐晓渡回忆了与施家彰的交往经历,谈到其诗歌创作视野开阔、重视细节,颇富博物学特质,文化构成也极为博杂。王家新认为,施家彰的诗是一种蒙太奇式的并置艺术,体现了当下美国优秀诗人共有的创作趋向和写作技艺。蓝蓝则从施家彰的诗中不断读到“悲悯”,认为这些作品既像放大镜也像显微镜,对世界上最本、最严峻的问题持续探究。(刘鹏波)

## 第六届鄂尔多斯诗歌那达慕举办

本报讯 日前,由《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主办,鄂尔多斯市文联、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多彩鄂尔多斯”系列文化活动——“我为鄂尔多斯写首诗”诗歌主题活动暨第六届鄂尔多斯诗歌那达慕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

此次诗歌那达慕的举办,旨在以诗歌的形式进一步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化、鄂尔多斯的城市变迁,激发更多诗歌爱好者的创作热情。活动期间,主办方举办了“我为鄂尔多斯写首诗”采风创作走基层、“诗歌与自然”诗歌论坛、2023年鄂尔多斯诗歌颁奖晚会,以及鄂尔多斯诗歌诵读、曲水流觞诗歌赋、谈古话今闻诗关、诗词文创赶集市等活动。

自2016年创办以来,特别是鄂尔多斯市荣获“中国诗歌之城”称号以来,鄂尔多斯诗歌那达慕已成为当地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之一。